

【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对中国“大外交”格局形成的贡献

王家云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周恩来对中国新时期“大外交”格局的形成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一是在外交主体上的突破,既重视首脑外交,又积极开展政党外交、民间外交;二是在外交对象上的超越,既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积极开展与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三是在外交内容上的拓展,既有政治外交,又有经济外交、文化外交。

关键词:外交主体;外交对象;外交内容;经济外交;文化外交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1)06-0701-06

“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1]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关系的调整,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主体、对象与内容,较之于改革开放前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于是有了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及“大外交”格局的形成。但是,这种“大外交”思想与格局的形成又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与实践者,周恩来对这种“大外交”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诚如邓小平所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2]我们应该珍视这一外交成果的继承性,并从中获取更多有益的启示。

一、外交主体的突破

传统外交通常是以主权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对外活动。周恩来对“大外交”格局形成的贡献,首先是率先突破了政府外交为主体的外交格局,初步形成了包括政府、首脑、政党、民间等在内的较为广泛的外交主体格局。其中民

间外交颇具特色。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为当今中国“大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努力开展政党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党派林立,发展也比较快。这些政党不仅以其对内政策等活跃于本国政治舞台上,而且以其对外政策活跃于国际社会舞台上。作为新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凭借其外交家睿智的头脑、高超的外交艺术与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在着力发挥首脑外交作用的同时,又非常重视政党外交作用的发挥,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党、社会党,他都努力推动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动国家关系的建立与改善。

首先,周恩来认为政党外交有助于促进政府外交。1954年8月12日,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最近英国工党代表团将来华访问,我们将同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党派进行接触,这就要接触到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以外交学会的名义发出邀请,他们马上就决定组织以艾德礼为首的代表团来。他们答复如此迅速,是同推进中英关系有关的。”^{[3]79}所以,我们应当重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1957年4月15日,他在同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团谈话时指出“可以说和社会党不是新交,而是有几年

收稿日期:2010-11-26

作者简介:王家云(1949-),男,江苏涟水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的关系了。对许多政治问题也已经多次交换过意见。今天,又承团长代表日本社会党正式把社会党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前途的展望,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表示钦佩。”^{[3]225}鉴于日本社会党不承认“两个中国”并要求日本政府迅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原则立场,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中提出,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最终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旨在打破恢复中日外交困难局面的思路得到日本社会党的认同。政党之间彼此交换意见,说明各自政策,有助于求同存异,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此后,日本社会党始终站在恢复中日邦交运动的第一线,为中日友好和恢复邦交奔走呼号,为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周恩来认为政党外交应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原则。一是不干涉其他政党的内部事务。他告诫党内同志“一个党是什么性质,不决定于叫什么名字,而是决定于它执行什么阶级政策。政策要在实践中加以证明和经受考验。”^{[4]380}1955年1月,他在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首任会长林田省藏和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铃木一雄一行时说“中国人民绝不干涉日本人民的内政,日本人民选择哪一个党组织的政府,我们都承认,尽管中国人民赞成社会主义,也不能把这个制度输出日本。革命不能输出,政治制度要人民选择,国外任何干涉都只能失败。”^[5]二是坚持求同存异。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相互尊重。”^{[4]81-82}1972年4月12日,周恩来会见以日本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春日一幸为团长的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时指出:两国的政治团体讨论问题,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是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为共同的目标奋斗。比如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邦交^{[4]519-520}。本着上述原则,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同英国工党、日本的工党和社会党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族民主党派进行多次交往,这种交往打破了国家交往的局限性,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建立。

再次,政党分歧不应该妨碍国家关系的发

展。中苏两党关系曾一度恶化,除了苏联大国主义的原因之外,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周恩来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各政党之间也应求同存异,不能因为思想分歧而影响国家关系,而应坚持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分离的原则。为阻止中苏两国关系的逆转,周恩来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苏共22大与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周恩来都率团出席,希望谋求中苏关系的改善。1965年2月与1969年9月,周恩来分别会见了途经北京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强调中苏两党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打仗。因为两国政府首脑的努力,1969年10月,中苏两国在北京恢复边界谈判,1970年10月至11月,两国重派大使、恢复双边贸易,空中、界河航运也得到改善,这既缓和了相对紧张的边界局势,又为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创造了条件。其影响正如柯西金对日本的池田大作所说的“周总理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如果有机会,请你转告周总理,只要周总理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6]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注意政党外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积极同世界各类型的政党进行交往,努力克服国家交往的局限性,不仅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打开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拓展了新中国外交的空间,提升了新中国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共处,而且为新时期政党合作推动外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率先开拓民间外交。周恩来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3]52}。因为有了外交的落脚点在于影响和争取人民这一精辟的认识,新中国的外交便有了周恩来开拓的民间外交这一新形式。

民间外交,一种是指有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民间外交活动,旨在推动国家关系的友好发展;另一种是指没有外交关系的民间外交活动,旨在推动国家关系的建立。就后一种外交活动而言,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同日本国营铁道工会访华团的谈话中指出“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需要两国政府的努力,但也需要两国人民的推动。”“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更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3]169-170}他在

1957年11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目前我国对外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有民间来往的60多个国家,可通过和平友好、文化交流、贸易来往等活动打开局面……这种形势要求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不通过外交途径也可以做很多工作^[7]。这就是民间外交。

民间外交对国家关系正常化所起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周恩来即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旨在通过民间交往的发展,逐步带动并促进官方关系的建立。1955年他指出“人民的态度可以影响政府,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意见,因为它要争取选票。”^{[3]146}“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3]171}本着这一认识,周恩来积极推动中日民间外交的开展。据《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一书不完全记载,周恩来自1953年至1975年的22年中,会见日本的客人多达298次,接见日本各界访华团体200个次,有一次会见多达260人,有的会谈在深夜持续6个小时以上。周恩来对来访者,无论是党派领袖、国会议员,还是专家学者、普通老百姓,不分职务高低,不论出身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接待,推心置腹。有日本学者感叹,这样的领导人古往今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坚持长达20多年的“积累渐进”的民间外交方式,最终完成了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其意义正如周恩来在上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那样“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到那个时候,只剩下中国总理、外长和鸠山首相、重光外相喝香槟酒了。”^{[3]171}这是对民间外交成就最公正的评价。

周恩来开创的中日民间外交,不仅率先在历史上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突破中日国家关系的坚冰,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还为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对我国的封锁、制裁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中国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外交主体的重大突破。

二、外交对象的超越

周恩来在谈到外交对象时非常明确指出:

“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3]52}然而,世界上的国家又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社会制度的不同。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即谈到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他说“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3]122}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该影响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外交要做的工作就是勇于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通过“求同存异”,争取和平共处。这正是形成当今“大外交”格局所需要的外交理念。

(一) 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伊始,周恩来在着力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同时,非常重视与亚非拉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有共同的基础,即共同的历史遭遇与共同的现实任务。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3]121}正是有了这一共同基础,他在会议期间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加强团结合作。他的努力不仅使与会的亚非国家的代表消除了对新中国的偏见、疑虑和误解,开始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予以理解与信任;而且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关系有了广泛的发展。1955—1964年,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就有26个;1955—1963年,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也有13个^[8]。

其次是洞察其战略意义。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周恩来即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予以高度的评价。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在发展中,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结论,历史终究会做出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假如这一力量好好地组织起来,将会所向无敌。”^{[4]36-37}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首次集中地对一系列非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他实地考察之后,情不自禁地为非洲的

觉醒发出由衷的欢呼“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个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9]也就是说他当年预测的这种力量正在显现。这个力量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获得国际支持的主要力量。因此,周恩来不仅主张在政治上、道义上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主张经济上慷慨解囊,给予亚非拉各国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并亲自拟定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关心和指导八项原则的实施。因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得到亚非拉人民一贯的坚决的支持。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就是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亚非拉国家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毛泽东曾说,不要忘了,是亚非国家的穷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10]185}

(二) 努力发展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周恩来即指出:不承认国民党与美英法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国家毫无区别^[11]。

首先,对瑞典、瑞士、丹麦等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积极的态度争取建交。原因在于:一是这些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态度比较积极;二是“它们承认新中国,割断了同蒋介石的外交关系,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支持新中国,特别是在联合国支持恢复新中国的地位、反对蒋介石的代表”^{[3]155}。三是历史上同中国有着经贸关系。因此,新中国于1950年相继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

其次,对英国、荷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半建交”的方式推进外交关系建立的进程。原因是“它们承认新中国,同蒋介石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在联合国又支持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的地位。”“我们同它们就只有半外交关系”^{[3]155}。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既坚持原则立场,又积极磋商,坚持接触。后经过努力达成协议,建立代办级关系,即“半建交”方式。这“半建交”方式使新中国与英、荷等国关系向前迈进了一步,也为逐步向全建交方式的过渡奠定了基础。在中美关系取得突破之后,英、荷

两国同中国随即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

再次,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只要他们不改变敌视态度就不急于同其建交原则。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顽固地坚持不承认政策,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二是煽动其西方盟友在对新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与新中国为敌;三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对新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企图孤立新中国;四是阻挠恢复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因此,周恩来指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但是,“我们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3]222}。为此,周恩来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1954年10月,他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时表示:“美国如果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也欢迎,我们并不排斥美国,我们愿意同它和平合作,是它不愿意同我们合作。”^{[3]92}在次年的万隆会议上,他再次表达这一愿望,他说“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3]134}本着这个原则立场,他既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又积极推动中美两国政府的接触。中美两国1955年8月开始大使级会谈,历经15年136次会谈,增进相互间了解,努力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为后来两国关系的转变留下了余地。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调整,加上中美两国首脑特别是周恩来的积极推动,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周恩来在外交对象上勇于超越,不仅推动中美、中日等发达国家关系正常化,而且带动了国际社会与新中国新一轮的建交高潮;既使新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得到大幅度的拓展,又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大外交”格局的真正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奠基性贡献。

三、外交内容的拓展

诚然,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前,因为特定的国际环境及“左”的政策的影响,新中国外交内容比较单一,面比较窄。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他对外交内容上的认识上是清醒的,并在实践上积极拓展,努力发展各个层面上的外

交关系,为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外交内容上的“宽领域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思想与实践基础。

(一) 努力开展经济外交。周恩来在着力开展政治外交的同时,努力开展经济外交。他认为,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而且经济上的交流有助于推动政治上的交流合作。1956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强调“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12]226}

鉴于这种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深刻认识,周恩来主持新中国外交伊始在着力开展政治外交的同时,对经济外交亦予以极大的关注。早在1949年8月10日,新中国尚未宣布成立、对外建交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恩来即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东欧各国,均与我们有通商要求”望转告,“我们欢迎他们派代表来北平商谈通商及其他一切有关事宜”^{[5]837}。在随后由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的外交政策中,便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显然,积极发展经济外交,不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而是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1956年10月10日,他对英国来宾说“我们不排斥西方,只有互相帮助,各国的经济才能发展很快。”。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而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即提醒参与接待的同志,要“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3]81}。1957年,他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好处”,“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3]244}他强调“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是在建设中的国家,一个是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当

然是有贸易可以互通的。”^{[3]250}他甚至对中美两国已经八年没做买卖感到十分遗憾。此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英籍作家韩素音有过这方面的记述,她写道“周说中国愿意向美国开放市场。美国西海岸的商人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很不满。”“到1963年为止,周还相信如果他能了解肯尼迪、了解肯尼迪的性格的话,也许中美双方会开始对话,而作为中国生命线的贸易便可能得以改善。周说中国愿意向美国开放市场。”^[13]为此,周恩来主张首先是请进来,要把门打开;其次是要派出去,虚心学习,努力为经济外交服务。

(二) 努力开展文化外交。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当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中伤和封锁,又加上我们自身观念上的障碍与经验的缺乏,在中国不多的国际交往中,有些问题通过政治外交一时难以奏效。为此,周恩来及时开拓文化外交这一领域,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往,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接触与了解,进而推动政治外交。

新中国的文化外交被周恩来视为“鸟之双翼”的一翼。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在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的谈话中即指出文化交流的目的,他说“我们希望诸位回去以后就像在这里所说的那样,使日本当局也能改变一些自己的看法。”^{[3]93}其目的是促进政治外交。1955年11月1日,他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也谈到法国只承认蒋介石,中法关系只能在人民中先发展起来,“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然后水到渠成”^{[3]157}。即希望通过代表团互访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外交关系的建立。1956年2月13日,他对即将赴埃及等非洲国家演出的一个部队歌舞团的演员说:你们是第一批去非洲的,是外交工作的先遣队^{[5]548}。基于这一深刻的认识,周恩来积极推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建立后的10年间,不仅同社会主义各国家建立并发展文化关系,形成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而且积极发展同周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交流,努力扩大中西文化交流,推动我国同欧洲、北美、大洋洲文化交流的进程。

首先,有助于增进国与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上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有20个独立国家,当时同我国都没有外交关系。为改变中国与拉美各国人民之间隔离状况,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头十年里,我国不仅邀请了19个国家的一千多人士来我国访问,而且组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这种文化上的频繁交往,为我国同拉美国国家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有助于实现求同存异。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曾因历史上的日本侵华战争,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恣意反共反华,政治外交陷入僵局。周恩来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其中重要的形式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中寻求共同心声,求同存异。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中,日本表演艺术方面来华多达507人次,凡来访的艺术界的人士,周恩来总是挤时间予以会见、交流,以其真诚友好的态度感染来访者。我国去日本访问演出的440多人次,其中1956年,受周恩来派遣,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率团访问日本,曾掀起了中日友好的热潮。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恰如周恩来所说“解放十年来,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近两千年的来往,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同近两千年比起来,50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12]321}

再次,有助于推进政治外交的实现。作为文化外交,最典型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周恩来充分利用文化外交手段,积极推进中美双方的接触。一是1970年9月,我驻法使馆按照中央通知,邀请寓居在西欧的著名美国记者、作家斯诺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周恩来把斯诺和夫人领到天安门城楼正中,与毛泽东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幅照片,这实际上是在向美国政府发出愿意谈判的信息。二是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周恩来协同毛泽东紧紧抓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机会,机智地通过民间外交渠道,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

门。中美华沙会谈谈了15年没解决问题,而从邀请乒乓球队打球到尼克松访华却不到10个月,中美联系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乒乓外交”,“小球转动了大球”,这既加速了中美双方政要接触的进程,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总之,周恩来在外交内容上的清醒认识以及为拓展外交内容所做的努力,尽管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对中国新时期“大外交”与大开放格局形成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参考文献:

- [1] 曹在禄. 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06(5).
- [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55.
- [3]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4]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5]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443.
- [6] 邓在军, 周尔均. 百年恩来[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71.
- [7]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98-99.
- [8] 谢益显. 中国当代外交史: 1949—2001[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185.
- [9] 周恩来传: 1949—1976(下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739.
- [10] 曹应旺. 中国外交第一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85.
- [11]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799-800.
- [12] 周恩来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13] 韩素音.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393.

责任编辑: 张超

ABSTRACT

Zhou Enlai's Con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Pattern

WANG Jia-y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Zhou Enlai made the following founda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pattern: First is the breakthrough of foreign body. Zhou Enlai attached importance to summit diplomacy,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party-to-party diplomacy and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second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foreign objects. Zhou Enlai focus on diplomacy with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transcending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o frequently develop the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third is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content, including political diplomacy, economic diplomacy and cultural diplomacy.

Key words: foreign body; foreign objects; foreign content; economic diplomacy; cultural diplomacy

Mao Zedong's Views on Science

ZENG Mi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Sichu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Sichuan 610072,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interpreted the complex concept of "Scienc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by studying and absorbing the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n science from various subjects. On the basis that science is the embodiment of knowledge, he raised the idea that scienc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knowledge. On the basis that science is to search for truth, he introduced that science is the weapon of searching for truth. On the basis that science is the tool to change the world, he proposed that science is armed forces to fighting for freedom. On the basis that science is soc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e thought that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national defense. Mao Zedong's scientific minds explained the basic areas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Mao Zedong; scientific concept; thought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ic Foundation of the Unity of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ased on "The Same Science" Perspective in the Manuscripts of Economic Philosophy of 1844

ZHU Chun-shan¹, WANG Rong-jiang²

(1.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001, 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chieving the unit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by academic circles, which has not been resolved. In the Manuscripts of Economic Philosophy of 1844, by transforming Feuerbach's "perceptual" criticism, Marx established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man and na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made an ideological assertion that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 science essentially belong to "the same science". Marx's "the same science" idea impli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y of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emotion and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based on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re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and the end for human liberation, a blend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uman science; perceptual practice; the same science

Heidegger's Thought on Human-World Rel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

LIN Hui-yue¹, LI Xi-qi², XIA Fan³

(1. & 3.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Hunan Information Science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Basing on "Dasein" of Ontology, Heidegger demonstrated that human-world relation and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 are an operational and practical relation and he did a skillful critique from existential and humanistic standpoint. Contemporary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focus on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 and it shows experience turning besides metaphysical tradition. Critique of technology is important, bu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is more fundamental. Through the adjustment and control of technology, the ecological balance system among man,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can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Heidegger; human and the world; human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phenomenology

The Equal Ideas from Taoism History Books of Yuan Dynasty

LIU Yong-hai¹, WU Shan-zhong²